

社会治理,在共同富裕中起着“压舱石”作用。在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上,近年来湖州积极探索并成效明显,但也有着系统性不够、精细化程度不高等短板。要实现富民与安民的有机统一,率先形成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新格局,必须——

# 探索共治共富路径



扫一扫,看更多内容

## 淬炼能力 优化共享

吴卫华:我们知道,数字化改革是做好“智慧治理”顶层设计的基础,您认为如何通过数字化改革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?

唐亚林:以前我们通常讲“三生”,即生产、生活和生态,现在我经常提的是“五生”——生产、生存、生活、生态和生命。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,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,从理论上都可以在一个屋子里面完成。这背后的深意值得我们思考:“五生”给生存方式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等带来了革命性变革,这就倒逼政府要进行智慧治理,实现数字化转型。

政府的数字化转型,要用“金字塔”结构来分层看问题。首先是智慧化城市的“底座”,是网络信息系统体系建设、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。建议湖州在规划环节就做好这一点,因为只有好的技术底座,才能避免反复推倒重来。在“金字塔”的中层,形成数字化生产、数字化经济、数字化生活、数字化文化等。最高层则是理念、规则、标准、制度和体系。

建议湖州的智慧治理要形成一个整体性诊断,在一网通办、一网统管以及二者的融合等方面多作探索,进行系统性评估,补齐从底座和上层反映出来的短板。在这个过程中,尤其不能忘了人的体验感和参与感,否则最终会步入成本投入大、后续创新发展跟不上来的窘境。

最后,在通过数字化改革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,要注重制度型开放,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,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,使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跟上更新换代的步伐。

吴卫华:您认为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压力,让那些长期工作、居住、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?

唐亚林:大量的外来人员从农村来到城市,这给市域社会治理确实带来了不小的挑战,湖州也是如此。面对这一情况,湖州要顺应大时代的变化,主动去拥抱流入的外来建设者。首先,要以常住人口来进行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,包括公共服务的拨款,教育、医疗资源的布局等。其次,要根据常住人口来设计相应的服务人员的编制管理,甚至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。第三,要让大家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,让新湖州人真正把湖州认同为自己的家乡,时刻感受到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湖州还可以探索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的管理模式、文化模式、服务模式等创新工作,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,甚至还可以开展一次新湖州人与湖州人的大讨论,让“故乡再造”成为湖州市域社会治理的一张“金名片”。

吴卫华: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,湖州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,进一步深化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?

唐亚林:一个城市的发展愿景,不外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。湖州各方面做得好,因此可以多加一个高水平共享的标签。要跳出湖州看湖州,把湖州放到长三角城市群的视角,尤其是把它放到上海大都市圈的框架之中来思考,打造成为上海大都市圈自身五大节点城市之外的又一个节点城市。深化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,首先,要做到“规划引领”,就整个湖州市域社会治理问题进行规划布局、挂图作战。第二,要实行“领域突破”,按照“地区分类、项目分解、任务分领、经验分创、责任分担”的方式,进行分类突破。第三,要实行“项目带动”,通过项目或者活动来作为联系纽带和具体推进手段。最后是“榜样示范”,来带动参与协商和整体合力,最终筑稳共富的“压舱石”,提升群众共治共享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记录整理:记者 王炜丽 陈静怡

## 创新理念 做大“蛋糕”

吴卫华:您如何看待共同富裕与市域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?

唐亚林: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,需要许多基础性制度安排,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其中关键一环。

在我看来,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把传统的“县域(郡县)安、天下安”变成了“市域安、天下安”。首先,提升了县域发展的层级。从县级进入到更高的地市级。其次,扩大了发展的规模。原来一个具有几十万或上百万的人口,上升到市域范围之后,可能会有几百万人口的规模。第三,提升了发展的能量。人口的增多、规模的扩大、统筹层级的提升,都会带来发展能量的提升。

打个形象的比方,原来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做“蛋糕”,现在是在一个更大范围、更高层级的区域空间内统筹发展,把“蛋糕”做得更大,最终达到提升发展品质和质量的目的,然后让更多人来共享这块更大规模、更为精品、更高质量的“蛋糕”,这就为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愿景。

吴卫华:您认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领域,湖州需要如何深化内功?

唐亚林:我认为应该从以人为中心、以事为中心、以效率为中心和以和谐为中心四个方面入手。

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是以人为中心,这一点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方面。第二个方面,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。比如说发展之事,把“蛋糕”分得公平、分得更均匀;还有生活之事,要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,着重体现在公共服务水平上。第三个方面,应强调以效率为中心,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层次的治理。最后,要以和谐为中心,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追求的是平安、快乐、健康、和谐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。

四个“以什么为中心”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不同要求,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比如说以人为中心,可以落实到发展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;以事为中心则是服务于人;以效率为中心是一种评判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;而以和谐为中心,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秩序和文化层面的感受。

吴卫华:湖州在乡村治理上有余村经验,在镇域治理上有织里经验,又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矛调中心的市县乡镇三级全覆盖,那么如何提炼已有的基层治理经验,把它运用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?

唐亚林:我到过湖州很多次,这里不仅生态环境好,而且老百姓安居乐业,确实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。那么,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?

首先,要专题专组。针对湖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些重大专题,专门组织相应的领导小组,然后专题研究、整体布局、统筹设计。

第二,要专项专做。任何事情的发展都要靠项目或者活动来推动,治理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因此,建议湖州在设计出一些总体项目框架以后,要细化成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型的项目去主攻。

第三,要专业专能。基层很多事物与事务带有综合性的特点,但同时更需要专业性力量。比如,在矛调中心,除了志愿者,更应该加入律师、政法系统人员以及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专业力量。专业人做专业事,可以把社会问题处理得更好,也更权威。

### 受访专家 唐亚林

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大都市研究中心主任,《复旦城市治理评论》联合主编,中国政治学会理事,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,中国宝武集团顾问。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、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、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、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。



### 采访专家 吴卫华

湖州学院教师,校聘教授、博士、硕导,博士生导师,毕业于苏州大学,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,首届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“高层次拔尖人才”,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评论专业委员会理事,《北京文化创意》杂志评审专家。



## 完善体系 融合“四治”

吴卫华:在打造市域治理现代化体系过程中,湖州需要格外注意哪些方面?

唐亚林:治理体系现代化,简单而言,就是通过组织架构的现代化发展,提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。

就湖州来说,打造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,首先需要注意整体性,通过上下贯通、左右联动的整体性建构来做文章,尤其是要把市、县、区、乡镇街道及村社区四级有效联动起来。

第二点是协同性,强调各个层次的信息共享,大家齐心协力来做事。比如,一个餐馆要办营业执照,涉及到多个部门,每个部门不能只管好自己的“一亩三分田”,而应该实现信息互通共享、办事管事联动一体。从许多城市的实际情况来看,“信息孤岛”现象不同程度存在,湖州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。

第三点是功能性,这是对人的要求。通过前期组织架构的构建、整体性和协同性的作用发挥,最终激发出人们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意愿、能力和功能。

最后一点是合力性,就是全民参与性。我建议湖州可以开发一个“随手拍”APP,与城市大脑指挥平台联网,每一个湖州人都可以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参与者、各种事件处置的发动者、社会治理效果的评判者和城市精神的宣传者。

吴卫华:法治,是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您认为湖州应当如何优化市域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体系?

唐亚林:首先,要坚守根本原则,就是要坚持有法可依,执法必严,违法必究。一定要形成信仰法律、敬畏法律、遵守法律,自觉按照法律规范来办事的氛围,也就是法治文化的形塑。

再者,用好、用足地方立法权。赋予地方立法权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制度安排。湖州于2015年被赋予地方立法权,接下来,要加快推动这块工作的步伐,可以通过立法大检查等形式,倒逼各个地方性法规落到实处,取得实效,形成湖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特色和品牌。

最后,可以积极探索形成一些“软法律”。治理注重的是人,只要有人的地方,公序良俗就能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。希望湖州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,注重发挥市民公约、村规民约等批评、教育、示范、引导等作用。

吴卫华:湖州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、智治“四治”融合基层治理中,该如何各施其能又相互融合?

唐亚林: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,“四治”是缺一不可的,要以法治强保障,以德治强教化,以自治强活力,以智治强支撑。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,“四治”各有侧重、各有所长,又各自相互配合、彼此融合。

以社区治理为例,在一般的观念里,这是以自治为主的,但其实不然。社区的居民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、物业管理提供的市场化服务、社会组织提供的由政府购买的公益性服务、业主委员会等各类组织提供的自治性服务……这些服务,有的算自治的内容,有的不算,但可能同时都集中到同一个人或同一批居民身上。这些服务需求的表达、满足和评判,都要由老百姓说了算。这些服务往往是叠加的,不是一个自治单独能够解决得好。所以,“四治”实际上是能够截然分开的,打通后效果会更好。

打通“四治”,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党建引领。当然,党建引领不是党员、党组织包办,是党组织带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,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,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,最终建成依法依规、自我管理、民主协商、睦邻互助的“四治”融合新社区。

